

访谈魏根深：

老外写的《中国历史研究手册》靠谱吗

本报首席记者 单颖文

1973年，一本名为《中国近代以前历史研究手册》（*The 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: A Research Guide*）的7万字中国历史学习笔记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。44年后，以此《手册》为蓝本的《中国历史研究手册》中译本问世，厚厚三大本，290万汉字。其间，

另有5版《手册》修订本相继问世。这些《手册》的撰稿人和修订者都是一个人——英国学者魏根深（Endymion Wilkinson）。

据统计，这部凭一己之力历经半个世纪编写的《手册》，共援引了10391种原始资料、二手资料和数据库，取材于中、英、日、法、德、俄的论著。

魏根深说，撰写《手册》是为了编纂、传播，而非创新，也可以说是对全世界中国史研究的梳理、回顾和总结。

领衔《手册》中译本翻译的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侯旭东说，魏根深不是要去“治史”，而是“要提出新的视角、观点和思想”。



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有两个突出优势

文汇报：2016年9月，根据您的英文版著作翻译的《中国历史研究手册》面世。我们知道从1973年以来，您一直在修订、出版这本书的英文版，先后有5个版本，请问您是从何时开始萌发撰写这本书的想法的？

魏根深：那要从50多年前说起了。我1960年进入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学习，1962年开始自学中文，1963年从历史学系转到东方学系就读，1964年本科毕业到北京语言学院教了2年英语，1967年获得了剑桥大学东方学硕士学位。1968年，我作为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生第一次去哈佛大学。1971年，我以伦敦大学副教授的身份到哈佛访学。当时费正清先生是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所长，现在那里已经改名为费正清研究中心了。费正清先生很注意培养年轻人，他每周会抽一天请所有研究所的学生到他家去聊天，大约聊2小时。

一天晚上，我跟大家一起去了费正清先生家。他问我现在在研究什么，我说我在伦敦大学教远东历史学，然后讲了自己学中国历史的经历，并告诉他我有一本记录自己学中国历史的笔记，是从研究生时候开始记的。费正清先生对这本笔记很感兴趣，让我寄给他，我就给他寄了一章。他收到后说这个应该尽快出版，我说这是我的笔记啊，不好意思给大家看的。他对我说，你要是想

等书写得很理想了再出版，那就等死了以后再说，现在出版的话可以收到别人提的意见，书是可以修改的嘛。

1973年，这本书就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，当时书名叫《中国近代以前历史研究手册》，大概有7万英文词。1996年，哈佛大学提出希望我重新修订这本书，我又改了很多内容，并做了大量补充，扩充到了32万词，1998年出版了《中国历史手册》。2000年推出了第二版修订本，书名叫《中国历史手册》，接近42万词。2012年出版了第三版修订本《中国历史新手册》，篇幅增加了3倍多，达到150万词。2015年，第四版《中国历史新手册》问世，增加到了152万词。2016年9月《中国历史研究手册》中译本上市，分为上、中、下三大本，汉字290万。

文汇报：您的《手册》在欧美汉学研究的学术圈很畅销，包括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（Ezra Vogel）、哈佛大学教授包弼德（Peter Bol）、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席文（Nathan Sivin）等学者都赞赏有加，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梅维恒（Victor H. Mair）称之为“每一位严肃的中国历史、文化研究者不可或缺的案头书”，有不少中国学者专程去欧美购买此书。2012年出版的《中国历史新手册》还获得了2014年法国儒莲奖（Stanislas Julien Prize）。即使在学界《手册》获得了高度认可，但大家好像总是疑虑，相信您也不止一次被问到，一个外国人能对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说出些什么创见来？

魏根深：我想这句话暗含的意思是，只有一国国民才能充分理解本国的历史，因为对于社会如何运行，无论古今，只有他们才有切身体验。但是当我问他们，如果要选择心脏病医生，是否需要以对方曾经患过心脏病为前提时，他们承认，直接经验并非必要条件。

26年前，我第一次到北大历史系，当时的系主任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研究哪个朝代？这可能就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传统，但我不是这么研究的。简单来说，我认为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有两个突出优势：其一，他不曾自小接受民族主义历史迷思的灌输，对于青少年的这种教育举世皆然；其二，外国人更容易以一种比较的视角看待中国历史。

另外，我想提到的一点是，《手册》援引的学术成果包括10391种原始资料、二手资料和数据库，取材以中文、英文与日文成果为主，兼及法文、德文与俄文论著。我希望诸位能注意到《手册》的另外一个特点：它不仅呈现了中国学者的成果，同时也包括全世界学者的贡献。

文汇报：从网上，我们可以查到不少中外读者撰写的读书心得，有些也对您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不同看法。请问在修订过程中，您会参考读者提供的修改意见吗？

魏根深：在欧美地区，一般关于中国的学术性专著可以卖600至800本，《手册》各英文版加起来大约卖了2000册。从1973年出版这本书开始，到2016年9月中译本出现之前，我一共收到过400多

位读者的来信，其中很多是专业的学者，他们提出了各种意见和建议。

有的读者告诉我有哪个字写错了。我记得1973年《中国近代以前历史研究手册》刚出版不久，杨联陞就给我写信，说第67页上有错别字。错字是一个问题，一是因为我用拼音打字，当电脑给出很多联想时我反而容易选错；二是虽然是英文书，但我尽量用中文字表达中国的专有名词，有些字在繁简转换的时候会出错。

有的读者告诉我哪部分的内容写错了。从内容上来讲，我当然犯了很多错误，因为我中国的历史确实有限。但学者们给出的意见往往也不尽相同，包括我也有自己的判断，不会因为别人怎么说就怎么改。有个中国研究生给我提了4000多条修改意见，我同意其中30%，并且修订到了书里，我给他写了信表示感谢。

文汇报：现在《手册》有了中译本，也会有更多中国读者，您会担心收到更多不同意见甚至抨击吗？

魏根深：我不太有这种担心。你想想，真正读史的史学家穷毕生精力写就的史书，到底会有多少人会读呢？像《中国历史研究手册》这种有290万中文字的书，只有很少数人会认真看，我估计只有2%到3%的人是从头读到底的，可能只有50个人吧。因为这是一本工具书，告诉你哪部分历史有什么学术成果，可以看哪些参考书，所以我想很多人买来也只是看其中一两个部分，甚至就一两页。

事实上，我不太在意网上

那些用网名写的书评，那很乱，有时候也不可靠。我觉得最好是学者或者学生给我写信，实名提出意见。

文汇报：在将近半个世纪的修订过程中，《手册》的写作目的发生过改变吗？比如，从中译本的序中可以读到，这本书是“介绍从史前至21世纪的传世第一手资料、考古发掘和人工制品资源，以及与生态环境变迁有关的资料”，而之前2000年版的序写的是“介绍从商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期，各个阶段、各个朝代的基本史料”。

魏根深：实质上没什么改变，只是提法上有些变化，我想表述得更清楚些。我一开始是想写到近代为止，但现在的版本加入了近代中国和当前的社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国作为一股崛起的力量，势必会受到世人关注。而研究中国历史，除了老生常谈的为了让人们了解这个古老文明的特别之处，更重要的是在于了解中国的过去是如何影响、形成现代中国的国家认同、国家政策等等。

简单说，中译本《手册》的编写主要有4个目的：一是向拥有中国文化和历史知识背景的读者介绍从史前至21世纪的传世第一手资料、考古发掘和人工制品资源，以及与生态环境变迁有关的资料。二是向学者们介绍中国历史的辅助学科。三是介绍涉及中国史范围内当前焦点以及争论问题的重要二手资料（涵盖国际学术界）。四是突出利用电子资源对中国历史资料进行传播、归类和分析，这些资料上起商代甲骨

（下转8版）➡